

伊朗局势如何影响当前及未来国际油价

韩建伟/文

毋庸置疑,2020年开年后的伊朗局势对国际油价的涨跌产生了十分显著的影响。

美伊关系影响油价

1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炸死了伊朗高级军事将领苏莱曼尼,引发了伊朗高涨的反美及复仇情绪,使得美伊开战的风险大大上升,国际油价也因此一路走高。1月3日,美国WTI原油期货市场价格上涨,报63.05美元/桶,涨1.87美元,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报68.6美元/桶,涨2.35美元。

美伊紧张局势在1月8日达到高潮,伊朗向美国驻伊拉克军事基地发射了多枚导弹,国际油价在几小时内就上升了4美元。但是形势很快发生变化,美国方面宣布没有任何人员伤亡,特朗普事后表示要与伊朗展开“无条件的谈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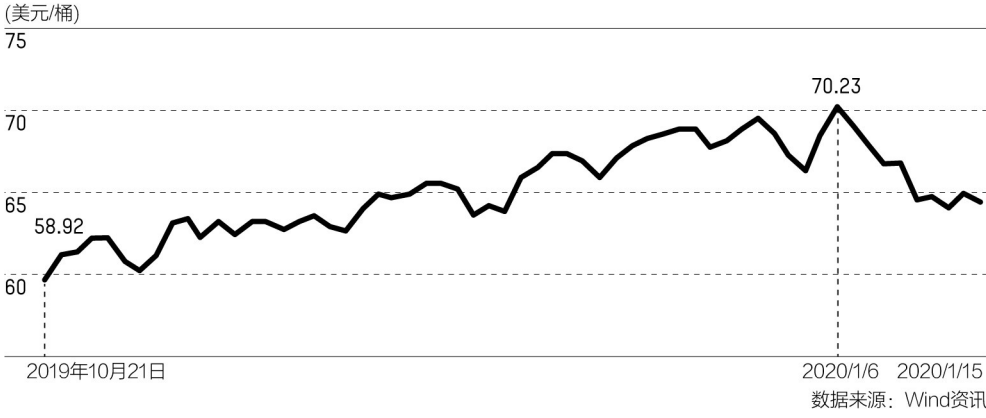
美伊局势降温令油市断供的风险随之下降,国际油价也因此大幅度下跌。截至1月8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09美元,收于每桶59.61美元,跌幅为4.93%;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3美元,收于每桶65.44美元,跌幅为4.15%。

油价总体取决于全球供需市场

作为大宗基础性国际商品,国际石油的价格总体上受全球供需市场关系的决定。从需求角度来说,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是石油价格上涨的主要驱动力,而主要经济体则对石油价格有较大的决定权。如当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因此中国能否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对油价有重大的影响。另外,在当前世界经济相互深度依赖的背景下,主要经济体之间的政治关系往往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油价也随之成为反映政治风向变化与经济增长预期的晴雨表。

而从供给角度来说,石油能否正常供应对

布伦特原油现货价格走势



40%
当前中东局势尤其是伊朗局势依然将对国际油价产生较大影响,霍尔木兹海峡承担着全球近40%的石油出口供应。

1/3
受多年制裁及油井老化等因素的影响,伊朗的石油日产量最高不超过400万桶,最大日出口量不超过280万桶,仅仅是沙特产能的1/3。

当前导致美伊博弈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苏莱曼尼之死,而是核问题。特朗普在伊朗发射导弹袭击美军基地后的发言一开始就强调,“只要我担任总统,就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蓬佩奥近期在斯坦福大学发表演讲,公开声明对伊朗的极限施压会进一步强化,要完全切断伊朗的石油出口渠道,同时对伊朗实施外交孤立与军事威慑。

油价也有直接的影响。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中东地区作为世界上主要的石油产地,一直影响着国际油价的涨跌。沙特阿拉伯、伊朗、伊拉克是主要的石油生产国,这些国家的政局变化、双边关系及与大国的关系都对国际油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不幸的是,中东一直是战乱不休、地缘政治的高风险地区。这一地区的国家经常不能处理好双边关系,也因美国等域外大国的深度介入而导致经常陷入冲突,成为造成国际油价剧烈波动的重要变量。

纵观已经过去的2019年,国际油价在稳中有升的同时,受到不断恶化的中东安全形势的强烈影响,尤其是伊朗局势及与之关联的海湾形势恶化的影响。国际社会担心的并不仅仅是伊朗局势本身的变化,而是担心伊朗在跟美国及海湾邻国(如沙特阿拉伯)发生冲突时,在极端情况下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会导致很多国家石油的断供。另外,伊朗及其他亲伊朗的地区武装组织可能会对沙特、阿联酋等国的主要石油设施发动攻击,造成后者石油开采及出口不能正常运转,从而引发油价的大幅度波动。

从油价稳定角度来说,确保沙特的石油开采安全的重要性要大大超过伊朗。伊朗虽然是一个产油国,但是其对国际油价的影响力远远无法与沙特相比。受多年制裁及油井老化等因素的影响,伊朗的石油日产量最高不超过

400万桶,最大日出口量不超过280万桶,仅仅是沙特产能的1/3。特朗普在2019年5月全面启动对伊朗的石油禁运之后,很多国家停止了从伊朗进口石油,却没有引起国际油价的大幅度上升。但是,在2019年9月沙特阿美两处油田遇袭之后,造成沙特减少一半产能,一度引发了国际油价的大幅度上涨,布伦特原油则冲到了71美元。

从长期来看,导致油价上升的主要因素有:第一,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达成令世界经济增长的前景趋于乐观,有利于国际油价的上涨。第二,欧佩克+的减产协议会小幅度刺激油价。2019年12月沙特率先减产,对国际油价的上涨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欧佩克减产协议的延期计划受阻,减产协议仅仅维持到2020年3月,因此不太可能大幅度抬升油价。与此同时,供给端的多元化及产能的增加令国际油价不会出现大幅度走高的局面。美国的石油产量在2020年会继续提高,美国计划在2021或2022年成为石油净出口国;俄罗斯并不愿意深度减产,2020年也存在增加产量的可能性;另外挪威、巴西等非传统产油国产量的提高,会进一步增加石油市场的供应。

未来伊朗局势如何影响油价

但是,当前中东局势尤其是伊朗局势依然将对国际油价产生较大影响,霍尔木兹海峡承担着全球近40%的石油出口供应。虽然当前伊朗局势有所缓和,但是美伊关系依然十分紧张。特朗普政府不仅很快祭出了新的制裁,而且要求伊朗重回谈判桌,签署“特朗普版”的伊核协议。最近英法德三国也对伊朗施压,要求伊朗重回伊核协议框架,与美国重新谈判。伊朗面临西方大国的压力不断增大。与此同时,由坠机事件和民生危机导致民怨加深及国内抗议不断,使得伊朗能否在高压下保持政治稳定也引发了高度的关注。概括来说,未来伊朗局势对国际油价的影响如下:

第一,美伊关系未来再度剑拔弩张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国际油价首当其冲。在苏莱曼尼死后,伊朗在与美国实力不对称的情势下采取了理性退让,而美国也无意与伊朗发生全面的战争,使得美伊开战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但是,美国对伊朗全方位的打压还在收紧,从近期特朗普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言论甚至可以看出,美国大有“乘胜追击”之势。

当前导致美伊博弈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

苏莱曼尼之死,而是核问题。特朗普在伊朗发射导弹袭击美军基地后的发言一开始就强调,“只要我担任总统,就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蓬佩奥近期在斯坦福大学发表演讲,公开声明对伊朗的极限施压会进一步强化,要完全切断伊朗的石油出口渠道,同时对伊朗实施外交孤立与军事威慑。

从伊朗的回应来看,伊朗传递出强硬与缓和双轨的复杂信号。鲁哈尼总统一方面对外声称当前浓缩铀储量已经超过2015年伊核协议前的水平,对英法德要求伊朗继续遵守伊核协议的要求给予了强硬回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1月17日的周五集体礼拜上发表讲话,将美国称为“小丑”,对英法德屈从美国意志的行为予以抨击,并誓言伊朗将抗争到底。但另一方面,伊朗外长扎里夫称和谈的大门并没有关闭,伊朗会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继续合作。但是,只要伊朗继续突破浓缩铀限制,所引发的危机会继续加深,也会给美国继续施压伊朗提供借口与机会。而以色列则一直表示,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如果伊朗重回核武研发的老路,美伊矛盾、伊朗与以色列的矛盾会再次尖锐化。虽然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能性不大,但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会再次受到战争的威胁,国际油价也可能会在短期内迅速飙升。

第二,影响国际油价的另一个变量是伊朗邻国的安全局势。这里主要指的是与伊朗关系紧张的沙特甚至阿联酋的油田或基础设施会否遭到攻击。由于该地区存在数目众多的恐怖组织及其他的非政府武装组织,因此很难判断谁将是袭击者。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类似2019年9月份袭击沙特油田的事件再次发生,美国会第一时间将矛头对准伊朗。沙特阿拉伯等国与伊朗直接开战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双边关系恶化必定会刺激油价在短期内上涨。

第三,能够影响国际油价的还有伊朗政局本身的变化。伊朗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是继续与美国对抗,还是寻求妥协,在牺牲部分利益的条件下致力于发展国内经济与改善民生。今年2月份举行的议会选举,将是伊朗政治变化的重要风向标。不过伊朗过去40年的历程表明,当前政府很难放弃与美国的对抗老路,同时存在遭受民众抗议与政权更迭的风险。伊朗的政局变化会产生一系列复杂的地缘政治效应,对国际油价也会产生多重影响。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

推进上海金融科技中心建设彰显国家层面的金融创新

翁一/文

2020年1月15日,上海发布《关于加快推进上海金融科技中心建设的实施方案》(下称《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提出,上海将在五年内建成金融科技中心,通过金融科技企业扶持、税收优惠、人才引进、长三角监管协作等手段,孵化更多全球领先的金融科技机构。

作为建设金融科技中心的一部分,上海市政府与蚂蚁金服、阿里巴巴集团同时宣布启动2020上海外滩大会。由蚂蚁主办、上海市政府指导的全球最大金融科技大会“外滩大会”将于今年4月在上海召开,预计以后每年将举办一次,并永久落户上海。

金融科技中心之于上海的意义

上海发布《实施方案》与当前金融科技作为国家重点发展行业有着密切关系。据统计,2018年我国金融机构技术资金投入达2297.3亿元,其中投入到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前沿科技资金为675.2亿元,占总体投入比重为29.4%。艾瑞咨询预计,到2022年中国金融机构技术资金投入将达到4034.7亿元,其中前沿科技投入占比将增长到35.1%。

正因为中央已经意识到了金融科技的未来发展趋势,央行于2019年8月印发《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19~2021年)》(下称《发展规划》),提出到

2021年,推动我国金融科技发展居于国际领先水平,实现金融科技应用先进可控、金融服务能力稳步增强、金融风控水平明显提高、金融监管效能持续提升、金融科技支撑不断完善、金融科技产业繁荣发展。这是央行出台的首个单独针对金融科技的顶层设计文件。

同年10月30日,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向辖内金融机构印发《关于促进金融科技发展支持上海建设金融科技中心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从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金融科技生态圈、深化金融科技成果应用、加大新兴技术研发、持续优化金融服务、加强长三角金融科技合作共享、提升金融科技风险管理水平、提升金融科技监管效能、加强人才培养和合作交流八个方面提出40项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可视为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贯彻落实《发展规划》的重要举措之一,旨在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联动发展,着力挖掘上海金融科技发展潜

能,深度激发金融科技发展活力,提升金融科技赋能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率,为把上海建设成为与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相适应的金融科技中心提供有力支撑。

金融科技中心之所以能够花落沪上,与上海一直以来的金融基因息息相关。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央就对上海提出要建设国际金融城市的重大战略决策。经过多年努力,上海已经成为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最前沿、金融改革开放的先行区,金融市场体系完备、中外金融机构集聚,是金融发展环境最友好的城市之一。这是上海作为传统金融中心的一个形象,在这个形象中着眼的是金融。而上海的另一形象,近年来它亦是互联网产业的深度参与者。我们知道,互联网发展到眼下阶段,其主要领域是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区块链技术,某种程度上“金融科技”的“科技”所指即上述四个领域。

在杭州获互联网之城称号,香港、深圳、新加坡争夺区域金融中心之时,

金融创新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需求端的变化和供给端的变化。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时代,需求端和供给端均受科技层面的强烈影响。可见,科技发展是推动金融创新的重要源泉。这种技术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降低了处理金融交易的成本;其次,它使得投资者更容易获取信息,从而为企业发行证券提供了便利。综上,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导致了我们所考察的很多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诞生。

上海作为中国最有国际风范的大都市,也在从金融中心向金融科技中心延展,从传统金融中心向现代金融中心延展。而作为建设金融科技中心的第一个重大动作,外滩大会是上海加速建设全球金融科技中心的信号。

普惠金融趋势不可逆

外滩大会可谓上海金融科技中心建设的第一步,其主旨定位在于推动普惠金融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流、切磋。所谓普惠金融,是指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性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具体言之,就是给所有具有真实金融服务需求的个人或者企业,提供平等的、无差异的金融服务。当然,普惠金融也是需要讲求市场性原则的,在发展普惠金融过程中,既要满足更多群体的需求,也要让供给方合理受益。目前,中国在金融科技助力下的普惠金融已走在前列。

中国金融科技之所以能够在普惠金融方面走在前列,有如下三个原因:

其一,大数据金融、互联网金融以及区块链技术的普及,金融科技的应用和发展可以降低商业公司的服务成本,从而能让更多的人尤其是贫困人口以更低成本、更为便捷地获得金融服务,分享更多实实在在的国家发展成果。也就是说,在传统金融中被排除在外的金融服务对象,因科技力量的加持,使获得金融服务的可能性大为提升。

其二,得益于中国飞速发展的互联网基础设施,中国在普惠金融领域培养出了一批金融科技企业,金融科技水平走在世界前列。中国的普惠金融实践,也已经在方便居民生活、提高

35.1%
到2022年中国金融机构技术资金投入将达到4034.7亿元,其中前沿科技投入占比将增长到35.1%。

金融服务获得性上取得了显著成绩。特别是上海作为中国传统金融中心,向着以金融科技为方向的现代金融转型具备天然优势。

其三,从更宽泛的层面看,非囿于上海一地,中国的普惠金融有着巨大的市场潜质。根据有关数据,截至2018年末,中国小微企业(包括个体工商户)数量达到9000万家以上,但仍有数千万长尾小微企业处于金融服务空白区。这些长尾小微企业,超过90%融资需求在50万元以下,80%融资需求在20万元以下。在征信方面,中国目前形成有效征信记录的人数仅为4.8亿人,占成年人比例不足40%,在传统依赖客户征信数据的信贷模式中,没有征信记录的个人和小微企业、个体经营者,自然被隔离在了正规金融体系的覆盖范围之外,“信用鸿沟”由此形成。上海推进金融科技助推普惠金融,不仅能够让更多的人获得金融服务,有效收窄“信息鸿沟”,还起到了先行示范作用。

金融科技赋能金融创新

无论是上海发布的《实施方案》,还是此前央行发布的《发展规划》,都揭示出金融科技的创新本质。毋庸置疑,金融科技能够赋能金融创新。金融创新的主体是金融机构。经济环境的变化推动金融机构寻求金融创新。

金融创新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需求端的变化和供给端的变化。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时代,需求端和供给端均受科技层面的强烈影响。可见,科技发展是推动金融创新的重要源泉。这种技术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降低了处理金融交易的成本;其次,它使得投资者更容易获取信息,从而为企业发行证券提供了便利。综上,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导致了我们所考察的很多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诞生。

同时,金融科技势必加剧银行业经营环境的竞争程度,从而引起这一行业的巨大变化,传统银行业务逐步衰落,传统金融体系全面重构势在必行。可以预言的是,以传统银行业务为代表的传统金融将被金融科技这一最新趋势所替代。

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中去,以实现对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并明确指出“创新”的五种渐次递进的内容——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组织创新。在笔者看来,金融科技背景下的金融创新正是熊彼特所言之“新组合”,并且涵盖了上述所有五个层面。

上海金融科技中心建设的推进表明,金融科技赋能金融创新已被顶层设计所认可并切实推进。而金融科技背景下的普惠金融,向我们展示了金融机构的创造性思维,一种对传统金融体系的全面重构,并展望金融体系的未来发展前景,从而帮助人们不断更新对金融的理解。

(作者系数字经济智库高级研究员)